

55712
477

苏联的社会变革

鲍里斯·迈斯纳主编

供内部参考

苏联的社会变革

俄国走向工业社会的道路

〔西德〕鲍里斯·迈斯纳主编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ocial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Russia's Path toward an Industrial Society
Edited by Boris Meissner
Translated by Donald P. Kommer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2

原著以德文出版。本书系根据美国诺特瑞·达姆大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英译本转译。

苏联的社会变革
俄国走向工业社会的道路
〔西德〕鲍里斯·迈斯纳主编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1,000字
1977年1月第1版 197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85 定价 0·52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1963年6月，西德东欧事务协会举办题为“俄国的社会变革”的第一次社会学讨论会。会上提出的一些论文，后来经过修改补充，汇集成《苏联的社会变革》一书，于1966年在西德出版。这里译出的是其中的三篇文章。

这三篇文章主要论述苏联怎样从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着重分析苏联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种种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指出今日的苏联已蜕变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戴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因此，他们不仅混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同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当权时期的本质区别，甚至污蔑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反之，他们对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事实却揭露得很不够，甚至把赫鲁晓夫采取的一些措施说成是“进步”的。

尽管本书的观点十分错误，但作者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各个时期的政策演变及其造成的结果，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且引用了相当多的材料说明苏联阶级的分化、工资差别的扩大、等级和特权的形成及发展、教育的提高同阶级分化的

关系，等等，对于研究苏联怎样变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原著为德文。中译本是根据 1972 年美国出版的英译本转译的。

目 录

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变革.....	鲍里斯·迈斯纳	(1)
一、苏维埃社会的演变		(1)
1. 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1917年—1921年)		(1)
2. 新经济政策(1921年—1928年)		(8)
3. 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29年到 1938—39年)		(15)
4. 战争与后期斯大林主义(1939年—1953年)		(32)
5. “新方针”与赫鲁晓夫主义(1953年—1964年)		(49)
二、苏联的社会结构		(63)
1. 形式上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		(63)
2. 新的工人阶级.....		(84)
3. 集体农庄农民.....		(92)
4. 职员和知识分子.....		(97)
5. 苏联的社会阶层分化.....		(117)
6. 苏联阶级结构的真相.....		(130)
三、小结和展望		(143)
苏联的教育政策和社会结构.....	奥斯卡·安韦勒	(145)
一、从社会学角度对苏联教育的分析		(146)

二、1917年后的苏联教育：它的平等——	
民主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 (148)
三、在斯大林干部政策下的社会分化 (156)
四、苏联全体居民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结构 (160)
五、从社会学角度看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 (166)
六、现代社会的教育在苏联的变种 (178)
从社会学角度看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响	
.....	卡尔·C·塔尔海姆 (181)

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变革

鲍里斯·迈斯纳

一、苏维埃社会的演变

1. 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1917年—1921年)

俄国革命主要根源于旧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虚弱。^① 这种虚弱——撇开战争条件不谈——是1917年2月成功的革命后俄国自由主义者所以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和巩固他们的胜利的主要原因。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都提倡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不能阻挡当时在策略上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最后胜利。

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坚持的急进的社会革命，确实是符合激进化了的群众的愿望和期待的。他们利用和驾驭被革命解放出来的基本社会力量，就能挫败那些以沿着西方民主路线

^① 见C·E·勃拉克：《俄国社会的变化》（196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英文版）及K·塔尔海姆：《苏联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第1版（1962年科隆德文版）22页及以下；又见K·H·罗夫曼：《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变革》（原收入本文集，本书未译出。——译者）

去改造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主要目的的敌手。

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夺取了政权，这是在苏维埃的合法斗争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① 但是塑造新政权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中的职业革命家，其中大部分属于旧俄知识分子的激进派，而并不是被认为真正是工人和农民代言人的那些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被用来作为创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的基础。^②

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在俄国的确发生了涤荡一切污泥浊水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按照从经济上的考虑和强权政治出发所制定的决策，在分成的若干发展时期或阶段中进行。^③

在以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为标志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④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人们对立和剥削的根本原因。对他来说，废除私有制是建立一个没有统治者因而也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使人的个性在自由与平等的最适宜的情况下得到发展。^⑤

当列宁把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下并废

① 见G·冯·劳奇：《布尔什维克俄国史》（1955年维斯巴登德文版）91页及以下。

② 见B·迈斯纳：《苏维埃民主和布尔什维克党专政》，载R·列文塔尔：《社会变迁中的民主政治》（1963年柏林德文版）153页及以下。

③ 关于苏联经济政策的社会影响，见塔尔海姆收于本书中的一文。

④ 见B·迈斯纳：《进步思想和社会改造》，载布克编的《进步的观念》（1963年慕尼黑德文版）107页及以下。

⑤ 见G·华根勒纳：《卡尔·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建设》，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1卷（1961年）249页及以下。

除市场经济时，他自己就是以马克思的这些基本观念为指导的。^① 他把这一点看做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从而也是缩小俄国同西方工业发达社会之间差距的手段。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必须消灭十月革命前掌权的上层社会阶级。在这些所谓“剥削阶级”中，有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工业人员、商人、房产所有人、文职官员等）以及地主和富农。这些“资本家”阶级在 1913 年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九，当国家进入国有化经济时，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因此，这些人生活的基础也被剥夺了。1918 和 1919 年，所有工业、金融、贸易和运输企业连同所有住宅和土地的私有财产都国有化了，同时地主和大多数大农场主的地产也都在农村无产阶级中间分掉了。继承私有财产的法定权利被废除了，1920 年小商业也国有化了。

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结束时，作为把革命前上层社会阶层拉平的这种初步尝试的结果，这些阶层仅存的成员都是那些宁愿降低他们的地位而侨居国外的人。1918 年夏，随着劳工权利的逐步受到限制，有计划的工业国有化付诸实施了。到 1921 年 1 月 1 日，大部分重工业包括五千八百三十四家工厂都国有化了，^② 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 1918 年夏季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机会来制订强有力的社会平等政策。列宁想要给普通工人固定的收入，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相等。内战和西方盟国封锁所造成的经济灾难，有助于把这个国家在社

① 见塔尔海姆：前引书 25 页及以下；H·劳帕赫：《苏联经济史》（1964 年赖因贝克德文版）34 页及以下。

② 见 H·冷培：《苏俄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发展》（1928 年柏林—布勒斯劳德文版）109 页。

会上拉平。一种普遍平等的情况终于实现了，不过是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上的平等。

可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势，这对了解苏联以后的发展是重要的。由于城市食物的供应情况，产业工人的人数减少了一半（1917年为三百万人，1920年到1921年为一百五十万人），同时职员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1913年为一百五十万人，1920年为二百四十万人）。^①

职员大部分来自公民权利已被剥夺的过去属于上层社会阶层的成员。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极力赞成雇用资产阶级“专家”。^② 早在1918年3月28日，托洛茨基就曾说：

“这些技术员、工程师、医生、教师和过去的官员，象我们那些闲置着的机器一样，是我国人民拥有的国家财富。如果我们要解决困扰着我们的许多基本问题，就必须迫使他们去工作……”。^③

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在托洛茨基曾对其创立起过主要作用的红军中，1921年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的指挥员是由过去沙皇的官吏和军官所组成。^④

在农村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业革命^⑤ 分两阶段进

① 见J·彼得罗夫和P·彼得罗夫：《苏联经济发展》（1926年柏林德文版）69页及F·朴洛克《苏联计划经济的试验，1917至1927年》（1929年莱比锡德文版）105页。

② N·I·卢钦科：《苏联知识分子》（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5页；W·霍夫曼：《苏联工人状况》（1956年柏林德文版）492页。

③ 列·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23年汉堡德文版）133页；霍夫曼：前引书492页。

④ 卢钦科：前引书6页。

⑤ I·P·基姆：《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发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

行。首先，把大部分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个体农民使用。

我们常常听说，革命的结果增加了一亿五千万公顷以上的可用农地，同时普通农民获得了过去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七。^①苏联的统计数字并没有证实这种说法。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报告，沙皇俄国的农地（按1939年9月17日苏联的边界计算）总面积为三亿六千七百二十万公顷。^②这些土地面积中，二亿一千四百七十万公顷（占百分之五十八）已由普通农民在耕种。^③在这个数字中，八千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在富农手里。^④余下的一亿五千二百二十万公顷（占百分之四十二）^⑤，其中六千一百万公顷大部分在贵族地主手里^⑥，而九千一千万公顷属

① 见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43页；苏联中央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汇编》（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97页；A·约各夫：《苏联国民经济及其问题》（1929年德莱斯登德文版）102页；O·奥哈根：《农业》，载G·多柏特：《红色经济》（1932年哥尼斯堡德文版）98页。

② 《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特辑〕（1959年莱比锡德文版）774页。根据《苏联国民经济》97页，这个数字是三亿六千七百万公顷。又见柯切托夫斯卡娅：《苏联的土地国有化》（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146页。

③ 《苏联》774页。根据《苏联国民经济》，这个数字是二亿一千五百万公顷，因而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可以假定，除了1907年在俄国欧洲部分四十五个州的那些农民村社土地和农民的私有地产合计达二千八百七十万公顷之外，这个数目还包括由地主和国家出租的土地在内（1917年共有三千八百八十万公顷左右），但哥萨克的土地不计在内。

④ 《苏联国民经济》97页。

⑤ 《苏联》774页。根据《苏联国民经济》97页，这个数目是一亿五千二百二十万公顷，因而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八。

⑥ N·奥岗诺斯基：《俄国经济地理概要》105页至109页；A·约各夫：《苏联国民经济及其问题》102页。地主的地产中还包括出租土地在内。在俄国欧洲部分四十五个州中，1907年贵族地产计达五千二百二十万公顷；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五十个州中，1905年商人、企业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产计达二千二百三十万公顷。

于国家、王室或教会所有。^① 这部分地产的绝大部分早已归并国家，^② 而大地主拥有的地产则主要分给农民终身使用。因为革命后个体农民耕种着二亿六千五百万公顷的土地，^③ 真正转交给他们的可耕地只有五千万公顷（百分之二十三点二）。^④

对于从城市大量移居农村的八百万人口来说，这种增加是不足以满足他们对土地的渴望的。^⑤ 每个农民平均增加的土地不到半俄亩（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或二点七英亩）。^⑥ 农业革命的第二阶段在1918年夏秋季进行，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收了富农拥有的五千万公顷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⑦ 同时旧时村社的土地也被没收，土地被重新分配。

① 这个数字包括军队和自治机关（城市等）的地产在内，这类地产在1903年俄国欧洲部分五十个州中总计有六百六十万公顷，大概也包括哥萨克的地产在内（1905年为一千五百八十万公顷）。1905年，俄国欧洲部分五十个州里属于教堂、修道院和神职领导人员的地产总计有三百二十万公顷。国家和王室的地产大部分是森林土地，只包括有限数量的农业可用地。

② 哥萨克土地不包括在这个数字内。

③ 这个数字来源于苏科洛夫：《苏维埃政府的农业政策》（1927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德文版）59页。

④ 见O·席勒：《苏联的农业制度》（1960年杜宾根德文版）14页。他虽然不是从这些统计资料着手，但他也承认这个数字。他的估计是以苏联的报告为依据的，即1920年11月1日俄国欧洲部分三十六个州增加的数量达到二千三百万公顷（百分之二二点六）。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阅H·劳帕赫：《苏联经济史》38页和A·约各夫：前引书103页。其中讲到俄国欧洲部分二十九个州经过苏维埃变革后，结果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

⑤ 见S·N·普罗科波维奇：《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国民经济》（1944年苏黎世—纽约德文版）63页。

⑥ 见约各夫：前引书103页；B·布鲁茨库斯：《俄国的农业发展和土地革命》（1925年柏林德文版）151页。在俄国欧洲部分二十九个州，革命前每人平均的可用土地为一点八七俄亩，革命后为二点二六俄亩。这个〇点三九俄亩的差额，相当于百分之二十一的平均增长率。在乌克兰，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

⑦ 见梁士琴科：前引书第3卷43页。

村社地产的重新分配扩大了小型农户数，从百分之五十七点六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点一，现在每一农户拥有约四俄亩的土地和一匹马，而拥有十六俄亩以上土地和四匹或更多马的大型农业企业实际没有了。①

农民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政策——强迫征收农产品以及通过组织生产合作社或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努力。② 由于农民反对这些改革，农业产量大大下降了，结果造成 1921 年的实实在在的大粮荒。③ 从 1917 年到 1920 年，人口从一亿四千三百五十万下降到一亿三千四百二十万；城市人口从二千五百八十万直线下降到二千另八十万，而农村人口则从一亿一千七百七十万下降到一亿一千三百四十万。④ 但是相对于城市人口来说，农村人口占这个国家居民的百分比实际已从百分之八十二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俄国作为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占压倒优势国家的这个显著特征，现在比革命前更加突出了。农业方面的社会结构虽然经受了影响深远和激烈的变革，但是农村生活许多旧日常见的特点依然如故。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国内工业部门才采取严厉而有力的措施，用完全新型的社会组织去

① 见 1922 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出版的（俄文）《1917 和 1919 年农民的经济分化》。又见约各夫：前引书 103 页及以下。

② 见布鲁茨库斯：前引书 160 页及以下；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 68 页及以下；塔尔海姆：前引书 26 页及以下；劳帕赫：前引书 40 页及以下。

③ 根据苏联官方统计，五百万人死于饥饿。著名的农业统计学家 A · N · 塞林舍夫教授则估计为九百万人。见布鲁茨库斯：前引书 166 页及以下。

④ 见苏联中央统计局：《1963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65 年莫斯科俄文版）7 页。

取代旧有的社会结构。当时由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所宣布的原则，以后仅仅在有限的实施范围内加以修订而已。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结构上的变革，一方面受内在原因所制约，另方面则受所应用的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意识形态虽然确实含有典型的俄国革命思想要素在内，却来源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可是，随着苏联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和俄国的民族要素有关的。这种变化的最初迹象，随着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在 1920 年俄波战争时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①

2. 新经济政策(1921 年—1928 年)

感到有必要维护革命所取得的社会成就，促使大部分居民在面临某种复辟势力时拥护布尔什维克。^② 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说成是民众对一党制国家的拥护。但 1921 年 3 月的喀朗施塔得叛乱，叛变者喊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连同迅速高涨的农民叛乱，就使这种说法成了疑问。^③ 这一连串事件引起的危机，迫使列宁在政策上作出深刻的改变，以求更加现实地来对付社会变革中的迫切问题。列宁把小自耕农看作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威胁，他说明这种农民小资产阶级是一种动摇的力

^① 见 W·马克特：《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中的俄国继承人》，载《共产主义制度中的人》（1957 年杜宾根德文版）63 页。

^② 阿瑟·罗森贝：《布尔什维主义史》（1932 年柏林德文版）116 页及以下。

^③ 见劳奇：前引书 173 页及以下；И·Я·特里丰诺夫：《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的阶级和阶级斗争》（1964 年列宁格勒俄文版）。

量。^① 在这一斗争阶段，布尔什维克巩固他们权力的唯一办法，是对中农的某些经济要求让步。1921年3月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的新经济政策（耐普）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②，它主要着眼于农业部门，谋求恢复以个人积极性为基础的有限制的市场经济来安抚农民。所有其他主要经济部门，诸如已经组织成托拉斯的重工业，仍然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绝对控制之下。

列宁自己把根据耐普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农民群众具有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特性会危及对这个政权的信念，这就加强他决心去抵制“工人反对派”企图使经济服从于职工会的政策和规章的计划。^③ 列宁把这种计划看做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因素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偏向。要使新经济政策成功，至关重要的当然是制止通货膨胀；1924年的币制改革在这方面是有帮助的。1927年，革命后十年，工业生产已达到1913年的水平，虽然各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产量相差很大。最后，由于粮食供应情况改善，群众方面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反抗似乎减弱了。

1921年春俄国开始经济建设时，布尔什维克党被迫从最初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完全拉平社会的尝试后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没有生气的平均主义，很快转变成以社会差别为特点

① 见1921年3月27日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491页）。

② 见塔利海姆：前引书29页及以下；劳帕赫：前引书47页及以下。

③ 见B·迈斯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工具的苏联工会》，载《外国研究》第2期（1953年达姆施塔特德文版）22页。

的社会了。①

起初，获准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农产品的农民获利甚丰。国家工作人员和普通工人之间工资的差距扩大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为了进一步复兴经济，在小商业、手工业和小工厂一级恢复私营企业。结果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情况得到了改善，同时属于旧社会的中、上层分子则利用市场经济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党的资产阶级倾向事实上已非常显著，成为马雅柯夫斯基著名的讽刺剧《臭虫》的主题。

革命后十年，当新经济政策临近结束，开始推行计划经济时，至少从表面上看，人口的社会结构和战前时代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大变化。② 1928年城市工人和职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三，而1913年占百分之十六点七；这期间农民和无组织的家庭劳动者的总人数从1913年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一跃升到1928年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九。只有“资本家”阶级成员大大减少，从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九下降到百分之四点五。其中较少数的人由于内战、革命和移居国外而消失了。但到了1928年，大量城市“资本家”都变成了职员。③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子女得到新经济政策时期提供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要比劳动人民的子女大得多。④

在日益增长着的工程技术干部队伍中，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老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实际上都被算作“工人”。更有甚

① 见阿瑟·罗森贝：前引书，157页。

② 下列数字的来源可以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找到。

③ 见R·费尔德密瑟：《苏俄坚持身分地位的利益》，载《美国社会学杂志》59期（1953年7月）21页及以下。

④ 见本书所收O·安韦勒的文章。